

## 美日印澳（QUAD）：从松散协调到同盟行为体

杨思灵\* 任吉蕾\*\*

**【内容提要】** 2021年是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即该地缘政治团体从过去松散协调过渡到了同盟行为体。回顾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推出概念、铺设战略、同盟演进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属于松散协调状态，后者则是形成同盟行为体阶段。之所以认为美日印澳已经从松散协调团体发展到同盟行为体，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该合作组织已经开始塑造共同的行为规范，并欲图在印太地区垄断规则。推动美日印澳实现同盟行为体的动力总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一般性动机的利益追求，二是新冠疫情、国家关系变化等带来的特殊背景，三是共同针对性的形成。三者的结合推动了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的同盟化。鉴于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是以中国为主要针对目标，因此该组织的同盟化对中国的安全环境也将造成不容忽视的冲击。作为应对措施，中国应实施“周边优先”战略，推进与周边国家相互尊重的“1+1”领导人峰会机制，推进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全面深化，以应对当前迅速变化的“印太”地缘政治局势。

**【关键词】** 美日印澳 美国 同盟行为体 印度 四边合作机制

DOI: 10.16608/j.cnki.nyyj.2022.01.03

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Quad）针对中国，或者兼而对付俄罗斯，但学界对于其有效性及其前景却存在一定的怀疑。客观来看，即使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进入同盟行为体阶段，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分歧就此消失。

\*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但四边合作进入同盟阶段却显示了当前四国在地缘政治上遏制中国的决心。学界往往将美日印澳四边合作形式的改变看作其改变的重要标志，尤其是从部长级机制上升为首脑峰会机制。其实这只是表象。全世界的首脑峰会并不少，比如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机制，但这些合作组织和机制并不具备同盟的性质，虽然有一致性，却并没有特别针对的国家行为体。因此，带给美日印澳四边合作同盟变化的并不只是首脑峰会的出现，而是同盟行为体规范的出现。回顾美日印澳四边合作的历史，迄今为止该组织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推出概念（2007～2016年）、铺设战略（2017～2020年）以及同盟演进（2021年以来）。前两个阶段为松散协调阶段，第三个阶段为实现同盟行为体阶段。推动美日印澳实现同盟行为体的动力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对传统的一般性利益的追求，二是新冠疫情等带来的特殊背景，三是共同针对性的出现。三者的结合推动了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的同盟化，这不仅对印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态势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也对中国的安全环境造成不容忽视的冲击。

## 一、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的三个阶段

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的三个阶段分别代表了该组织的不同状态。在推出概念阶段，主要是概念的传播、接受、引导。在铺设战略阶段，基于四边合作机制，各个主要行为体开始提出、阐述、传播自己的印太战略，并在核心理念上达成一致。在实现同盟行为体阶段则根据战略协调一致，再次确定共同的针对目标，建构共同的行为规范，并使之固化与强化。在这个意义上，当前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确实值得关注，但有更持久性影响的是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因为它试图用较为广泛的排他性规范引导整个地区，对中国的影响更为严重。

### （一）推出概念（2007～2016年）

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出现之前，有学者提出了“东亚四边”的概念，即美国、中国、俄罗斯和日本。<sup>①</sup>彼时，印度的崛起还没有被认真对待，中国经济也还未显露出规模上的优势，澳大利亚也仍在重视经济合作。但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印度崛起的呼声也在增加，地缘政治经济形势快

<sup>①</sup> Anand Rao, "Is the East Asia Quadrilateral Sustainable?" *Asian Politics & Policy*, No. 13, 2021, pp. 266-279.

速发生变化，基于“印太”的Quad顺势产生。只是中国和俄罗斯成为四边合作机制要针对的主要目标和次要目标，四边框架的设想补增了印度和澳大利亚，地缘政治背景也从东亚变为“印太”。Quad的灵感源于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当时参与救灾的印度、美国、日本与澳大利亚展开联合行动，并随后建立起了外长级的框架。<sup>①</sup>不过伴随着印太概念的出现与传播，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被广为人知。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印度议会演讲，提出更广泛的亚洲正在通过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动态耦合”出现，呼吁印度、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以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sup>②</sup>实际上，日本希望建立的就是所谓民主国家的“海洋联盟”。2007年，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在东盟峰会期间举行了非正式会晤，并讨论了跨国安全、应对恐怖主义与海盗问题。<sup>③</sup>在这一时期，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受到了中国的关注。当时的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表示，“不存在联合起来反对中国的问题”，“四边集团没有任何安全含义”。<sup>④</sup>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也选择退出四边联合军事演习，其政府官员也声称澳大利亚并不寻求这样的四边合作机制。<sup>⑤</sup>

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表面上中止，但事情却悄然发生变化，四边合作的概念也没有全然隐退。一方面，因为其后“印太”概念的出现、传播与四边合作的设想密不可分。在推进印太概念期间，美印日、美日澳以及双边层面的印美、印澳、印日等安全互动日益紧密，尤其在美印日层面，美印两国的联合军演机制从双边演变为多边，“印太”概念也日益成为各方推进安全互动的主题词，为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概念的复兴以及铺设印太战略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有的国家依然在传播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概念。比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12年抛出的“亚洲民主安全钻石”战略，旨在塑造包括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在内的国家联盟保护“印太”海洋

① Ashok Sharma, “Quadrilateral Initiative: An Evaluation,” *South Asian Survey*, Vol. 17, No. 2, 2010, p. 238. Quoted from Vinay Kaura, “Incorporating Indo-Pacific and the Quadrilateral into India’s Strategic Outlook,” *Maritime Affairs: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Maritime Foundation of India*, Vol. 15, No. 2, 2019, p. 81.

② Vinay Kaura, “Incorporating Indo-Pacific and the Quadrilateral into India’s Strategic Outlook,” p. 81.

③ Ibid.

④ Ibid.

⑤ Ibid.

美日印澳 (QUAD): 从松散协调到同盟行为体

安全。日本实际上从未放弃这一努力,在其自由开放的“印太倡议”中继续推进美日印澳合作机制的概念。<sup>①</sup>在日印、美日印等互动中均蕴含了在合适的时机与地区其他国家加强磋商的意图,其实是暗示希望澳大利亚加入四边合作机制,也暗示四边合作以及“四边合作机制+”的回归。<sup>②</sup>可以说在这一时期,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是隐形的,通过双边与三边机制践行着四边合作的主要目标与任务,这些合作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对所谓的中国“威胁”的建构为四边合作机制的复兴提供了动力。

美日印澳四边合作的复活基于“印太”地缘政治概念的传播。换言之,“印太”成为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迅速发展的核心概念与抓手。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是随着“印太”地缘政治概念的出现而被加强的。印太地缘政治概念被创造出来或者说回归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亚太地区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变化。很大程度上,美国人将印太概念的出现归功于自己,尤其是美国将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之后。但日本人则认为,“印太”概念成为地缘政治概念是安倍晋三首相的功劳,因为在2007年安倍晋三就在印度议会提出了“印太”是两大洋汇合之处的观点。印度的海军也热烈欢迎“印太”的地缘政治概念,澳大利亚也被认为是“印太”地缘政治概念的重要贡献者,然而实际上德国人早在1942年就使用了这一概念。<sup>③</sup>关于“印太”的概念之争,直到现在各方仍然未能达成高度一致,有观点认为“印太”概念主要指从东印度洋延伸到西太平洋的区域,<sup>④</sup>但是日本的规划却包括了印度洋与太平洋。<sup>⑤</sup>

虽然有概念内涵上的差异,但美日印澳都高度赞同与认可“印太”地缘政治概念。因此,尽管这一时期学界讨论主题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

<sup>①</sup> Vinay Kaura, “Incorporating Indo-Pacific and the Quadrilateral into India’s Strategic Outlook,” p. 82.

<sup>②</sup> Gauri Khandekar and Bart Gaens, *Japan’s Search for Strategic Security Partnership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 82.

<sup>③</sup> “Keynote Speech by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at Indian Ocean Conference in Maldives,”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 September 3, 2019.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31915/Keynote\\_Speech\\_by\\_External\\_Affairs\\_Minister\\_at\\_Indian\\_Ocean\\_Conference\\_in\\_Maldives\\_September\\_03\\_2019](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31915/Keynote_Speech_by_External_Affairs_Minister_at_Indian_Ocean_Conference_in_Maldives_September_03_2019)

<sup>④</sup> Shankari Sundararaman, “India-ASEAN Relations: ‘Acting’ East in the Indo-Pacific,”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54, No. 1-4, 2018, pp. 62-81.

<sup>⑤</sup> 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日本外務省。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430631.pdf>

“亚太再平衡战略”，但是在四国的官方文件中，亚太叙事逐渐被“印太”叙事所取代。正如有人指出，“印太”概念日益重要，尤其美日印澳国家的官员在演讲及声明中频繁论及“印太”。<sup>①</sup>一向被视为对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保持谨慎态度的印度实际上对“印太”概念的出现也乐见其成。有观点认为，印度政府领导人、外交官、智库机构、知名学者对使用“印太”术语表现出浓厚的兴趣。<sup>②</sup>早在莫迪执政之前，时任印度总理的曼莫汉·辛格就认为印太两洋交汇处的概念为印度与日本的关系确定了新的框架。<sup>③</sup>“印太”也同样成为印度定位和推进与美国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框架，早在多年之前，印度就主动表达愿意在“印太”框架下开展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sup>④</sup>日本对印太概念的推动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尤其是2007年前后提出要在印太地区建立美日印澳海洋军事联盟。其中，安倍晋三的推动作用尤为明显。2007年安倍晋三呼吁日本与印度在两洋交汇之地形成领导性同盟，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合作，维护“印太”地区的安全。<sup>⑤</sup>在这一时期，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概念从激发“印太”想象再经历表面上的隐退，印太概念的深入传播又为其高调复归奠定了基础。

## （二）铺设战略（2017~2020年）

在“印太”概念已经深入美日印澳各国的人心之后，铺设印太战略、推进Quad的复兴就成为必然之举。2017年东亚峰会期间，美日印澳进行了四边会晤，四边合作机制正式再次回归。美日印澳各国进入四边合作机制的铺设战略阶段。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16年正式提出了日本的“自由开放的印太”的印太战略。其基本点有三个：推广和落实法治、航行自由、自由贸易等；根据国际标准，通过“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发展等加强连通性，追求经济繁荣；提高海上执法能力，支持和平与稳定，包括防灾、不扩散等。<sup>⑥</sup>

<sup>①</sup> Shankari Sundararaman, "India-ASEAN Relations: 'Acting' East in the Indo-Pacific," pp. 62-81.

<sup>②</sup> Ngaibakching and Amba Pande, "India's Act East Policy and ASEAN: Building a Regional Order through Partnership in the Indo-Pacific,"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57, No. 1, 2020, pp. 67-78.

<sup>③</sup> David Scott, "India and the Allure of the 'Indo-Pacific',"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9, No. 3&4, 2012, p. 173.

<sup>④</sup> Ibid.

<sup>⑤</sup> Gauri Khandekar and Bart Gaens, *Japan's Search for Strategic Security Partnerships*, p. 75.

<sup>⑥</sup> 「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の実現のために，日本外務省。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9/html/chapter1\_00\_02.html#T001

美日印澳 (QUAD): 从松散协调到同盟行为体

其推进的具体策略是与伙伴国家共同推进“印太”战略的实施。

美国的“印太战略”铺设直接以中国为针对目标。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推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将中国列为“修正主义大国”。其战略认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崛起是21世纪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美国认为，“印太”地区日益面临一个更加自信和过分自信的中国，它在追求广泛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时不断与其他国家产生摩擦。<sup>①</sup> 美国同时不忘吹嘘自己对“印太”地区的所谓贡献：“我们为维持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与机遇贡献了鲜血与财富，我们的存在保证了‘印太’地区关键的海上走廊的安全，奠定了全球商业与繁荣的基础。我们的领导人、外交官、军事理论以及商业活动帮助形成和加强了清晰透明的国际制度规则，和平解决争端以及法治对地区的相对安全及持续繁荣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sup>②</sup> 在这样的基础上，美国提出了自己的“印太战略”并进行部署。对于如何展开美国的印太战略，美国的答案是加强联盟和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在战略铺设阶段，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完成了在双边层面的战略对接与安排。换言之，在战略铺设阶段完成了双边与三边的“印太战略”对接任务，为后续进入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奠定了基础。比如日印之间达成日本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和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对接。正如苏杰生所说，印日共同确认了维护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印太’概念被越来越广泛地接受。在这方面，印度提出的“印太倡议”是很有前途的发展。<sup>③</sup> 日美达成共同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共识。<sup>④</sup>

在战略铺设阶段，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举行了多次部长级的磋商会谈。但这些磋商只是松散的协调机制，并没有形成四边共同行动的规范。比如在第三次磋商会议上，美日印澳共同声称，致力于维护以规则为基础

①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ne 1, 2019, p. 7.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②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p. 2.

③ “Opening Remarks by EAM at 2nd Quad Ministerial Meeting in Tokyo, Jap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 October 6, 2020. <https://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33097/opening+remarks+by+eam+at+2nd+quad+ministerial+meeting+in+tokyo+japan>

④ 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戦略，日本外務省。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8/html/chapter1\\_00\\_02.html#T001](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8/html/chapter1_00_02.html#T001)



的国际秩序，这种秩序以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法治、透明度、国际海洋航行自由以及和平解决争端为基础。<sup>①</sup> 会议同时重申了四边对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明确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此外还讨论了新冠疫情、气候变化、海上安全、供应链韧性、反恐、缅甸局势等问题。<sup>②</sup> 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中，各方在“自由、开放和繁荣的印太”这一目标之下也体现了细微的差异：印度认为该概念应当加入“包容性”，美国强调互联互通、“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符合国际法的海上安全，日本重视印太地区的基于规则的秩序、航行自由和海上安全，澳大利亚的观点包括基于规则的秩序、航行和飞越自由、互联互通等。<sup>③</sup>

从铺设战略来看，各方都在突出自己的重点，但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中实现了汇合。经过战略铺设，尤其是合作战略对象的不断选择，美日印澳四边均意识到将各自的印太战略依托于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是最佳选择。有观点认为，日本领导人安倍晋三与印度首相莫迪建立起了信任关系，日本首相菅义伟也美国总统拜登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之间建立了信任关系，这是实现美日印澳面对面首脑会晤的“根基”。<sup>④</sup> 当然在战略铺设的过程之中，各方对印太战略也在进行修正，比如各方先后强调东盟中心地位，同时在四边磋商层面就东盟中心地位达成共识。因为这些国家意识到缺少东盟，地缘政治集团遏制中国就将成为空谈。比如印度提出的“印太战略”中多了包容性，其实质反映的是地缘政治集团内部的话语权争夺，与包容的本义相去甚远。

### （三）同盟演进（2021年以来）

美日印澳四边合作升级到元首级首脑峰会，并决定每年都举行一次峰会，这引起外界的极大关注。据报道，美日印澳四边首脑峰会的定期举行

① “3rd India-Australia-Japan-USA Quad Ministerial Meeting,”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 February 18, 2021. <https://mea.gov.in/press-releases.htm?dtl/33540/3rd+indiaaustralia+japanusa+quad+ministerial+meeting>

② Ibid.

③ Vinay Kaura, “Incorporating Indo-Pacific and the Quadrilateral into India’s Strategic Outlook,” p. 83.

④ 田村龍彦：クアッド首脳会合 会合定例化も首相交代で信頼再構築が不可欠，*The Sankei News*，令和3年9月25日。<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10925-MZTIQR7HPZOABIOFPIHHDHNASI/>

美日印澳（QUAD）：从松散协调到同盟行为体

是日本首相菅义伟提议并促成的。<sup>①</sup> 可能有人会对美日印澳进入同盟阶段持有异议，毕竟总有美日印澳四边合作并非安全保障上的联盟这种论调，<sup>②</sup> 且各方对待美日印澳四边合作的态度有所不同，美国和日本最积极，印度与澳大利亚相对消极一些。但是这显然并不符合事实，尽管在对待四边合作机制上各国的诉求有所不同，但在地缘政治上对付中国却是共同的目标。正如四国自己所声称的，“为了地区的安全和繁荣，我们重申致力于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sup>③</sup> 而所谓的自由和开放就是自 2012 年以来在这些国家炒作南海问题、指责中国影响自由航行的基础上产生的。

美国致力于把美日印澳打造成地缘政治同盟，因此将四边框架视为牵制中国崛起的印太战略支柱。<sup>④</sup> 有观点认为，美国政府尤其是拜登政府将中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印太地区视为最重要的地区，并试图将共享民主和法治等价值观的 Quad 定位为“该地区决策的根本基础”，使之成为对抗中国的核心框架。<sup>⑤</sup> 尽管在 2021 年 11 月 16 日中美元首视频会晤时拜登提出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但美国在言辞上的出尔反尔已经不是一次两次，而且在 2021 年 3 月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暂行指南》中，美国提出要加强联盟和伙伴关系，遏制共同的威胁。<sup>⑥</sup> 相比之下，后者更能代表美国的真正战略意图。换言之，美国不大可能会因为对中国的承诺而放弃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的同盟化，反而会进一步加强。这一点充分反映在拜登政府的新印太战略中。2022 年 1 月 11 日，美国拜登政府发布了新的美国印太战略，其核心逻辑是以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为根本，以中国为核心针对目标，强调中国带来的挑战，<sup>⑦</sup> 声称其在未来十年的集体努力将决定中国是否成功地改变使印太地区和世界受益的规

① 田村龍彦：クアッド首脳会合 会合定例化も首相交代で信頼再構築が不可欠。

② 中国台頭へ対抗軸 日米豪印協力、深化優先，JIJI.COM，令和 3 年 9 月 26 日。  
<https://www.jiji.com/jc/article?k=2021092500388&.g=int>

③ 第 2 回日米豪印首脳会合，日本外務省，令和 3 年 9 月 24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p/nsp/page4\\_005424.html](https://www.mofa.go.jp/mofaj/fp/nsp/page4_005424.html)

④ 中国台頭へ対抗軸 日米豪印協力、深化優先。

⑤ 対面でのクアッド首脳会議、米の強い意向で開催 対中シフトを強調，毎日新聞，令和 3 年 9 月 25 日。<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210925/k00/00m/030/169000c>

⑥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White House, March 2021, p. 20.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⑦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22, p. 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则和规范。<sup>①</sup> 在此认识基础上，美国印太战略的主要实现路径依然是强化与战略伙伴及同盟的关系，其中尤其强调要继续支持印度的崛起以及其地区领导者地位。<sup>②</sup> 日本也有类似的四边合作机制的概念且一直在推行。将四边合作塑造成同盟的关键最后在澳大利亚和印度。实际上，整体上澳大利亚和印度都欢迎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只不过在态度上澳大利亚曾经害怕冲击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关系，印度则苦于来自其国内要求“战略自主”的困扰。澳大利亚前外长朱莉·毕晓普（Julie Bishop）表示澳大利亚欢迎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愿意加入马拉巴尔联合军演机制。她表示，四边合作机制是双边或者三边关系的自然延伸，是澳大利亚寻求与合作伙伴接触的众多方式之一。她认为，“如果四边合作建立在更高的水平上，这将使四国能够讨论所有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澳大利亚认为四边对话是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一种手段，并表明其与中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会影响澳大利亚政府维护其国家利益的努力。”<sup>③</sup> 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之下，澳大利亚在对华战略上完全遵循美国的要求，中澳关系迅速恶化，澳大利亚促使四边合作进入同盟阶段的决心得到增强。

对印度似乎在四边合作方面显得犹豫的原因，过去一般认为是因印度担心其与中国及俄罗斯的关系，但其实在推进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方面印度也有自己的想法。比如在将印美双边军事合作机制上升为美印日三边合作机制的过程中，印度是“施动者”，主动邀请日本参与马拉巴尔联合军演。印度在做出这一决定时，中印关系还处于较为稳定的时期。而在中印关系因为边界争端而陷入长期对峙之时，更有消息传出印度将邀请澳大利亚加入多边军事合作机制，最终 2020 年澳大利亚正式加入四国马拉巴尔联合军演，美日印澳四边军事同盟有了初级形态。从中可以看出，认为印度排斥和不情愿推进美日印澳四边合作的看法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不准确的，至少在军事安排层面，印度成功地将原来只是双边的马拉巴尔联合军演推进至四边，与 Quad 实现重合。可见，只不过是印度的虚荣心遮掩了真相，印度既想快速推进美日印澳四边合作的实现，又害怕别人对其失去“战略自主”指指点点，有损大国的尊严。因此，在如何实现同盟化与战略自主

①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p. 5.

②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p. 16.

③ Vinay Kaura, “Incorporating Indo-Pacific and the Quadrilateral into India’s Strategic Outlook,” p. 92.

之间的微妙平衡方面颇费思量,造成外界的很多误解、误读。甚至在澳大利亚刚开始退出四边机制时,印度大失所望。有印度战略家提出,澳大利亚离开之后,应当邀请该地区其他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加入,组成一个新的四边合作机制。<sup>①</sup>当然,近年来的中印关系波动明显,“经济脱钩”、“边境对峙”使印度迎来了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成为同盟的最佳时期,印度国内部分民族主义情绪支持印度联合美日澳三国共同对付中国,当然这更是印度主动选择的战略结果。

## 二、美日印澳成为同盟行为体的标志

美日印澳四边合作同盟化似乎验证了约翰·米尔斯海默的论断:现实世界依然是现实主义的世界,国家仍然是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者,没有守夜人凌驾于它们之上。<sup>②</sup>美日印澳操弄着说一套做另外一套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游戏,给地区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也是实现“大国政治的悲剧”的自我预言。结盟以加强自己的霸权秩序,排除和打击异己是美国霸权主导性的安全联盟战略支柱之一。即使在霸权型主导性的文明规范上,主张文明冲突论的塞缪尔·亨廷顿建议美国政府联合同类文明以打击、遏制异类文明。<sup>③</sup>标榜以“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的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正是这种逻辑下的产物。

那么什么是同盟呢?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美日印澳四边合作实现了同盟化?按照《辞海》的解释,在国际政治领域,同盟主要指两个和两个以上的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因共同利害而缔结的政治、军事或经济等方面的联合和协作关系。<sup>④</sup>以此而言,两个方面规定了同盟的内涵,一是有没有共同的利害;二是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就共同利害问题采取共同的有针对性的行动。当然如果仅以此来讨论同盟可能仍然存在不足,检验是否为同盟的标准还应当包括第三个方面,即就共同利害采取行动的国家集团

<sup>①</sup> Tien-Sze Fang, “The Asymmetrical Threat Perceptions in China-India Relations after the 1998 Nuclear Tests,” ProQuest LLC 2014, p. 223. <https://www.proquest.com/docview/899777388?pq-origsite=gscholar&fromopenview=true>

<sup>②</sup>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1页。

<sup>③</sup> 刘靖华:《霸权的兴衰》,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页。

<sup>④</sup> 《辞海》(第7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年版,第4371页。

是否在联合行动方面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以及是否形成共同的排他性的行为规范。最标准的同盟是冷战时期苏联为首的同盟阵营与美国为首的同盟阵营，每个阵营在对外行动上都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排他性的共同规范是检验同盟的终极指标，尤其是在检验该同盟是否具有凝聚力和持久性方面。

同盟是国际政治行为体中的一种，具有行动上的高度一致性。根据上述条件来对照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可以发现，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已经成为有一定独立性的同盟行为体。第一，就共同利害而言，美日印澳在“中国威胁论”方面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这个共识早就存在，只是有的国家表现得较为直接一些，比如美国和日本，有的国家比较委婉一些，甚至在某些时候出于一些利益将“中国威胁论”隐藏起来，比如澳大利亚和印度。从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再到特朗普及拜登政府的印太再平衡战略，目标所指都是所谓的“中国威胁”，几乎很少有立场上的变化。日本在安全和军事问题上紧跟美国，甚至是推进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最主要的推手与力量。在一段时期内，日本在经济问题上也希望与中国加强合作，推进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但近年来，日本对华态度发生了较大变化，体现在中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之后，日本政客以中国达不到规则而表达拒绝的意思，对中国台湾申请加入则表示欢迎。<sup>①</sup> 日本当局多名政要均表示中国要加入没那么简单，因为CPTPP的规则很高，却清一色地欢迎中国台湾参加。<sup>②</sup> 希望美国重返CPTPP，反映了日本试图加固美日印澳同盟以遏制中国的政治决心。在共同利害的认识上，澳大利亚与印度的变化最大。过去澳大利亚似乎一直都比较重视经济利益，虽然偶有摩擦，但总体上希望保持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的主线还是比较清晰的，但近年来澳方却紧随美国的政策，大有不顾经济利益的意味。可能一方面是源于美国的同盟压力，另外一方面则是澳大利亚的地区野心在膨胀。至于印度在“中国威胁论”的利害共识上的态度，正如前文所述，印度其实非常欢迎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只不过更多时候需要应对来自国内要求“战略自主”的政治压力。当然，在表象上印度推动美日印澳同

① 河野氏、台湾のTPP加盟申請を歓迎、中国は「そう簡単ではない」、ロイター、令和3年9月24日。<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ldp-kono-idJPKBN2GK0KD>

② 西村豪太：日本政府が虚を突かれた中国「TPP加入」の裏側、東洋経済、令和3年9月28日。<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458700>

## 美日印澳（QUAD）：从松散协调到同盟行为体

盟化的动力源于中印关系的恶化。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印度本身既定的战略追求。

第二，在联合行动方面，建构由美日印澳各执一端的印太遏制网，限制、削弱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印太”地缘政治概念的迅速传播与美日印澳四边合作的设想息息相关。尽管最初在遭到中国的抗议之后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表面处于停滞状态，但各方在建构印太地缘政治图景中联合排除中国，似乎共同认定中国并非印太国家，在双边、三边互动中以中国为假想敌。在合作设计中，处处映射中国不透明、破坏国际规则，同时要加强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比如在印日领导人会晤中，双方声称为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与保障海洋安全，以加强地区连通性和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形成，在日印双边和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层面加强合作。<sup>①</sup> 在日印双方会谈中，还公开提及强烈反对中国的“经济威慑”、反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等。<sup>②</sup> 可以看出，这些国家在针对中国的联合行动方面已经无所顾忌。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层面，尽管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未提到中国，却处处针对中国。比如为了对抗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美日印澳四边合作共同推出了基础设施新框架，即“美日印澳基础设施与伙伴关系”。该框架声称按照国际规则和标准，如债务的可持续性，公平和透明的融资做法，<sup>③</sup> 实际上暗指中国在实施“债务陷阱”外交。

在联合行动方面，印度被认为是在拖后腿。正如前文所述，这是一种错觉。然而印度的“低调”也让一些人不满。因此，有人建议印度，“印太”是所有大国的优先事项，于印度而言，这是继“东向行动政策”之后顺理成章的下一步，也是摆脱南亚限制的一次突破。<sup>④</sup> 所以，印度应当提高“印太战略”的清晰度，不要被其他国家的看法所迷惑。“印太”时代已经到来，印太地区必须被视为“东向行动政策”的进一步推演。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的过渡本身就表明印度在东方的安全利害关系正在加深，印

① 日印首脑会谈，日本外務省，令和3年9月23日。https://www.mofa.go.jp/mofaj/sa/sw/in/page4\_005417.html

② 日印首脑会谈。

③ 日米豪印、インフラで新枠組み 中国の「一带一路」に対抗，JIJI.COM，令和3年9月26日。https://www.jiji.com/jc/article?k=2021092500470&g=int

④ “Keynote Speech by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at Indian Ocean Conference in Maldives”.

度将不再局限于追求其近邻的利益。这一点正逐渐反映在印度在太平洋地区安全关系的打造上，同时也伴随着日益增长的经济接触。<sup>①</sup> 通过在那里展示更强大的能力和贡献，印度对其他全球参与者的价值大大提高。这也让他们更加热情地欢迎印度进一步“向东行动”。从这个意义上看，对印度来说，正确的“印太战略”取决于确保更正确地实施其印度洋战略。<sup>②</sup> 有观点认为，推动印度加快融入四边合作的动力可能主要来自中国。因为中国的崛起将极大改变地区地缘政治形势，尤其可能获得对其他国家的支配权，包括印度。<sup>③</sup> 更大的挑战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波及印度，尤其当印度的利益与中国发生冲突之时。<sup>④</sup>

莫迪执政后，印度提高了参与美日印澳四边互动及推动“印太战略”发展的决心，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后。莫迪公开表示：“新冠疫情大流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塑世界秩序的机会，重新调整我们的思维。我们必须创建系统来解决今天的问题和明天的挑战。我们必须考虑整个人类，而不仅仅是那些站在我们一边的人。”<sup>⑤</sup> 印度外长苏杰生也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无疑为加强国际合作创造了更有力的理由，无论是在疫苗生产方面，还是在促进经济复苏方面。那些拥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人会发现更容易建立牢固的伙伴关系。要真正发挥作用，全球秩序必须解决大流行病引发的担忧和问题。<sup>⑥</sup> 针对中国，苏杰生表示，一个更加多极的世界应当实现去中心化的全球化，拥有多个供应链和更多的增长引擎。<sup>⑦</sup> 苏杰生进

① “Keynote Speech by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at Indian Ocean Conference in Maldives”.

② Ibid.

③ Ugo Tramballi and Nicola Missaglia, *India, the Modi Factor* (Milano: Ledizioni Ledi Publishing, 2018), p. 116.

④ Ugo Tramballi and Nicola Missaglia, *India, the Modi Factor*, p. 117.

⑤ “Foreign Secretary’s Remarks on ‘Indi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Covid World: New Vulnerabilities, New Opportunities’,”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 June 18, 2021.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33929/Foreign\\_Secretarys\\_Remarks\\_on\\_Indias\\_Foreign\\_Policy\\_in\\_the\\_PostCovid\\_World\\_New\\_Vulnerabilities\\_New\\_Opportunities\\_Public\\_Affairs\\_Forum\\_of\\_India](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33929/Foreign_Secretarys_Remarks_on_Indias_Foreign_Policy_in_the_PostCovid_World_New_Vulnerabilities_New_Opportunities_Public_Affairs_Forum_of_India)

⑥ “Speech by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at the ‘Future of Asia’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Nikke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India, May 20, 2021.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33870/Speech\\_by\\_External\\_Affairs\\_Minister\\_at\\_the\\_Future\\_of\\_Asia\\_Conference\\_organized\\_by\\_Nikkei](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33870/Speech_by_External_Affairs_Minister_at_the_Future_of_Asia_Conference_organized_by_Nikkei)

⑦ Ibid.



美日印澳（QUAD）：从松散协调到同盟行为体

一步指出，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多个层面做出决定、倡议和协商。就印度而言，它可以通过更有效的伙伴关系帮助加强全球经济并降低其风险。印度正在开展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供应链弹性计划。在涉及美国的四边合作机制安排方面，其议程涵盖疫苗合作、关键和新兴技术、半导体、供应链、关键材料和联通性等。<sup>①</sup> 有观点认为，印度总理莫迪一直奉行强硬和对抗性的外交政策，在过去的七年里，他基本上重塑了印度的外交政策，以配合他及其政党几十年来所追求的强硬民族主义政治路线。然而，莫迪政府的任何其他外交政策立场都不会像他决定让印度参与四边结盟那样重要，四边是一个以印太为中心的类似北约的战略联盟。通过加入联盟，莫迪移除了新德里外交政策的最后一个尼赫鲁主义支柱——不结盟。<sup>②</sup> 当然，可以想见，即使印度已经成为四边同盟的成员，也还是会宣扬其保持了“战略自主”与“不结盟”的本色，因为可能在印度人的世界观里，这两者之间根本就不存在矛盾。

第三，塑造共同的行为规范。一是逐渐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规范。在此前的互动中，民主价值观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价值观相互认同，是国际政治交往的背景。2021年3月的第一次首脑峰会中，美日印澳不仅提出了共享基本价值观，而且还提出了支持法治、航行和飞行自由、和平解决冲突、民主价值观和领土完整的原则。<sup>③</sup> 声明声称，基于普世价值，美日印澳将支持和平与繁荣，并寻求加强民主韧性。<sup>④</sup> 这意味着美日印澳同盟不仅以民主价值观为标准形成了排他性同盟，且正在形成民主干涉的小团体。换言之，民主价值观赫然是原则之一，表明民主价值观成为四边共同的行为规范，至少理论上如此。以前是日本和澳大利亚紧紧追随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干涉行动，现在印度也在民主价值观上与美日澳采取了共同的立场，比如公开声明与美日澳三国一起干涉缅甸的民主进程。与此同时，在与这些国家的互动中，印度外交官高度标榜“民主”、“自由”，暗地和公开批评中国的政治制度。在2021年9月的第二次首脑峰会上，美日印澳四边再次重申了这

① “Speech by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at the ‘Future of Asia’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Nikkei”.

② “India and the QUAD: Long Term Prospects,” Daily News, May 11, 2021. <https://www.dailynews.lk/2021/05/11/features/248921/india-and-quad-long-term-prospects>

③ 日米豪印首脑共同声明：「日米豪印的精神」，日本外務省，令和3年3月12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159229.pdf>

④ 日米豪印首脑共同声明：「日米豪印的精神」。



一原则。这意味着民主价值观成为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区分敌友的排他性条款，也使四边合作有了排他性的行为规范。当然也不排除此后美日印澳在实践中在该规范上的双标政策。

二是形成共同的规则规范。这个同盟针对的核心就是中国，因为这些国家一向认为中国“破坏国际规则”从而获益。因此，在两次首脑峰会上通过的两个联合声明均强调了这一点：美日印澳共同致力于促进植根于国际法的自由、开放和基于规则的秩序，以促进安全与繁荣并应对印太地区及其他地区的威胁。<sup>①</sup> 这点声明建立在长期以来尤其是自2012年以来这些国家所宣扬的中国“不断破坏国际规则”的基础之上。

三是试图形成排他性的供应链。在美日印澳四国中，美国和印度都曾高调地推进与中国的“经济脱钩”。在美日印澳的设想中，充满着巨大潜力的印度完全可以替代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尽管事实表明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但美日印澳试图推进削弱中国的供应链同盟的努力并没有停止。比如在疫苗供应链方面，在第一次首脑峰会上，美日印澳表示要生产安全、负担得起和有效的疫苗以加速经济复苏并为全球健康做出贡献，……共同努力促进疫苗公平地进入印太地区。<sup>②</sup> 这显然也是企图排除中国疫苗外交的共同努力。在第二次首脑峰会上，美日印澳再次强调要加强美日印澳的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再次重申确保将这种扩大的疫苗生产出口到印太地区和世界，同时美日印澳共同表示认识到开放和安全的疫苗生产供应链的重要性。<sup>③</sup> 美日印澳此举表明，这些国家仍然将在疫苗领域共同排除中国的影响力作为重要的共同目标与任务。在打造新供应链方面，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目标是先统一标准，最终目标是绕过中国的生产链，印度提供软件和设计，日本和美国负责制造。<sup>④</sup>

四是共同的技术标准规范。以安全为由拒绝与中国进行5G合作是这些国家共同的行动。美日印澳试图在技术领域形成由其垄断的标准，形成技术设计、开发、治理和利用的原则，共同推动和开放安全、透明的5G及之

① 日米豪印首脑共同声明：「日米豪印の精神」。

② 日米豪印首脑共同声明：「日米豪印の精神」。

③ 日米豪印首脑共同声明，日本外务省，令和3年9月24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238176.pdf>

④ “Why Quad Leaders Are Meeting in the Midst of a Pandemic,” *India Times*, September 21, 2021.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defence/why-quad-leaders-are-meeting-in-the-midst-of-a-pandemic/articleshow/86389180.cms>

美日印澳（QUAD）：从松散协调到同盟行为体

上的网络。<sup>①</sup> 这些所谓的安全、开放、透明均源于抹黑中国的所谓“不安全、不开放、不透明”。这表明在技术领域，美日印澳试图形成统一的标准，目标仍然是针对中国。根据美日印澳的声明，四边希望在技术设计、开发、治理和利用方面引领世界。<sup>②</sup>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一次首脑峰会中，蓝点网络再次被美日印澳所强调，意味着在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合作方面，Quad 将在技术标准方面对中国采取共同的行动。

五是在军事领域形成共同应对所谓挑战的共同行为规范。美日印澳四边合作出现之初其目的就是建立军事同盟，而该合作机制未来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军事同盟，也许还承担经济同盟的功能。2020 年美日印澳已经形成共同进行军演的同盟，尽管在四边首脑峰会中尚未涉及进一步的军事安排，但该四边合作机制距离军事同盟只差一纸协议。除了四边已经是军演的初级同盟之外，美日、美澳之间本来就是军事同盟。从 2016 年开始美印之间通过签订《后勤交流协议备忘录》（LEMOA）、《通讯兼容与安全协议》（COMCASA）和《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等一系列具有军事性质的协议，也在事实上确立了军事同盟的关系，因为这些协议几乎都是只有同盟国家之间才会签署。日印之间也早就签署了《秘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国防设备/技术转让协议》等具有同盟性质的军事协议。<sup>③</sup> 印澳之间也达成了《相互后勤支持安排》。在三边层面，美日印早有形成的三边军事合作机制，印日澳三边之间也在推动军事安排。可以说，美日印澳的军事同盟性质已经得到充分表现。未来，再加之 AUKUS 的出现，印日也将在军事准备方面向美国提出要求。因此，美日印澳形成高标准军事同盟并形成军事上的共同行为规范只是时间问题。根本的原因在于，“四边机制”是一种旨在对冲崛起中的中国的安全安排。<sup>④</sup>

六是美日印澳形成共同试探行为规范也是形成同盟行为体的一个重要表现。美日印澳针对中国的共同试探行为将进一步加剧。这些国家除了支持区域内外国家在涉台和南海等问题上进行不断试探、踩踏红线，更会直

① 日米豪印首脑共同声明。

② 日米豪印首脑共同声明。

③ インド共和国（Republic of India），基礎データ，日本外務省，令和 3 年 11 月 18 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india/data.html#section5>

④ Christopher Keegin Colley, “The Nexus of Naval Modernization, Strategic Rivalry: The Evolution of Maritime Power, and the Cases of India and China,” ProQuest LLC, 2018, p. 266.  
<https://www.proquest.com/docview/2124411817?pq-origsite=gscholar&.fromopenview=true>

接通过售卖武器、人员交往、国际组织等对中国继续进行试探，以达到支持相关方与中国进行对抗并同时为中国的外交局面创造更大困难的目的。

美日印澳同盟化是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美日印澳同盟的发展就一帆风顺，甚至不排除出现反复的可能性。从国际政治的发展历史来看，同盟是一个常在事物，但具体的同盟组织的存在时间并不会太长，像北约这样历经数十年的同盟为数并不多。可以说绝大多数的同盟往往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美日印澳同盟行为体内部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挑战，毕竟同盟行为体均是建立在各自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关键问题在于美日印澳中的印度可以做多项选择题，要保证同盟行为体的可持续、稳定性并非易事。与此同时，在更大范围内，越来越多的行为体不太愿意看到东亚地区陷入军事冲突的漩涡，影响经济发展议题。因此，美日印澳同盟化必迂回曲折，真真假假，比如以道德幌子掩盖其军事与安全同盟的真实目的，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美日印澳同盟化的发展。尽管美日印澳同盟内部存在挑战，但在10年至20年之内美日印澳同盟行为体将在印太地区对中国构成最主要的挑战。中国将2035年确定为实现强国目标的时间，中国也将在话语和行动上体现得更为进取，而这些国家则将中国的话语与行动纳入其地缘政治竞争范式内进行考虑。基于此，美日印澳同盟行为体在一定时期内会不断得到加强。

### 三、美日印澳同盟化动机

有人建议如果可能将美日印澳四边与“一带一路”连接起来，若获成功将有助于将多元化确立为国际关系新常态。<sup>①</sup>不能确定地说看不到这种前景，但在短期内显然看不到，而且相互融合连接的可能性也比较低，长期共存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与“一带一路”倡议之间动机的差别很大。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是一个地缘政治同盟，而“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是经济合作倡议，没有形成排他性规范，与四边机制截然不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本身就是美日印澳同盟化的主要目标。从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同盟化的动机来看，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一般性的、具有共同性的动机；二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殊动机；三是共同针对性动机，

<sup>①</sup> Marko Juutinen, “Kautilyan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Sino-Indian Dynamics in South Asia and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Journal of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Vol. 14, No. 2, 2018, p. 207.

## 美日印澳 (QUAD): 从松散协调到同盟行为体

尤其是在霸权国的牵引之下具有形成共同针对中国的同盟行为体的动机。三者的共同结合推动了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迅速同盟化, 形成同盟行为体。

### (一) 一般性动机

地缘政治的权力竞争是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同盟化的一般性动机。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 国际政治主要是由国家权力的争夺以及国家间力量的分配而决定的。<sup>①</sup> 在国际政治观念、地缘政治权力竞争上, 美日印澳同属同一思维阵营, 即崇信国际政治就是权力斗争的游戏, 因而这些国家并不能感同身受地理解中国提出来的“一带一路”倡议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理念与方案。在这些国家看来, 中国提出这些理念与方案, 旨在谋取地缘政治势力范围, 旨在寻求在地区中的支配地位, 旨在摧毁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建立由中国主导的新秩序。因此, 不管是经济合作倡议还是经济合作战略, 在这些国家看来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都是为了谋取国际政治权力。在这样的基础上, 这些国家还先验性地以所谓的“民主价值观”来区分敌友, 走西方民主道路的就是志同道合者, 其他的都是“异类”。客观而言, 其实质不过是为自己的地缘政治权力斗争披上画皮。

在这些国家看来, 中国数十年来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动摇了其权力根基, 尤其是因为这些国家都认为经济实力的增长必然会带来军事力量的增长, 那么对这些国家的地区影响也会相应增加。在某种程度上, 中国带来的地区经济结构的改变引起这些国家的不适应, 复活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就成为重要选择。从美国的逻辑看, 中国的快速发展“威胁”到了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 美国认为中国继续保持经济和军事优势并在短期内寻求“印太”地区的霸权, 最终将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优势地位。<sup>②</sup> 除此之外, 美国还指责中国利用经济手段发展战略利益。2019年2月12日, 美国“印太司令部”指挥官菲利普·戴维森 (Philip Davidson) 海军上将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提供证词说: “北京正在利用其经济权力手段, 破坏该地区各国的自治权, ……短期内容易赚钱, 但这些资金伴随着不可持续的债务, 透明度

<sup>①</sup> [美] 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 权力与冲突的根源》(何曜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 第6页。

<sup>②</sup>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p. 8.

下降，对市场经济的限制，使地区各国可能失去对自然资源的控制。”<sup>①</sup> 美国还进一步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正在利用经济诱因和惩罚影响行动，并暗示军事威胁说服其他国家遵守中国的议程。虽然贸易使中国及其贸易伙伴受益，但中国利用间谍和盗窃获取经济利益并将获得的技术转移到军队，这仍然是中国所有贸易伙伴面临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风险的重要来源。<sup>②</sup> 很显然，美国是将自己的霸权思想与思维惯性转移到了中国身上，认为在历史上美国依靠军事力量主导了国际秩序，那么中国也将做同样的事情，结果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全球霸权地位，与美国争夺权力。有学者指出，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正如多份美国战略文件所显示的，与中国的竞争现在必须成为国家的优先事项。在华盛顿看来，越来越明显的是，中国试图通过建立对印太地区的霸权来进行竞争。通过施加影响，北京将能够塑造贸易和地区秩序，以支持有利于其自身的繁荣、安全和政治利益。尽管这可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对于那些希望保持自由和自治的人来说，这也是不可接受的。<sup>③</sup> 由于美国倾向于将中国的行为分析为权力博弈中的举动，将其解释为中国试图重塑世界秩序，因此这种担忧变成了不安全因素。同样，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他的《注定一战》（*Destined for War*）一书中强调了伴随着21世纪中美之间权力转移的结构性危机，中国日益强大的力量和重要性以及美国捍卫现状的恐惧和骄傲，正在使这些国家“走向从未想要的战争”。<sup>④</sup>

毋庸讳言，在冷战的权力争夺中，随着苏联解体，美国以极大的优势获得了胜利，在地缘政治权力竞争中获得了超级大国的地位。自20世纪90年代伊始，有关中国可能“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言论就开始出现。约瑟夫·奈（Joseph S. Nye）认为，美国拥有着权重非常大的国际权力，主导规范由安全联盟、多边国际制度以及相对开放的经济政策组成，……美国

①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p. 8.

② Ibid.

③ Elbridge Colby, “Southeast Asia Must Deal with the World as it Is,” *Pacificforum*, June 21, 2019. <https://www.pacforum.org/analysis/pacnet-35-southeast-asia-must-deal-world-it>

④ Emily S. Chen, “Is China Challenging the Global State of Democracy?” *Issues & Insights*, Working Paper, Vol. 19, WP5, June 2019. [https://www.pacforum.org/sites/default/files/issuesinsights\\_Vol19WP5\\_FINAL.pdf](https://www.pacforum.org/sites/default/files/issuesinsights_Vol19WP5_FINAL.pdf)



## 美日印澳 (QUAD): 从松散协调到同盟行为体

霸权规范维持了 70 年, 如今遭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挑战。<sup>①</sup> 这是美国迅速调整其全球政策向亚太转移, 进而推动印太地缘政治概念并将之落实到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最主要的动机。正如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Mike Pompeo) 在美日印澳举行的四边会议上所说的, “聚集在东京的部长们都明白了共同的威胁和我们不仅在外交上而且在经济方面合作的机会, 以反击中方。”<sup>②</sup> 从上述可见, 地缘政治的权力之争是美国主导推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同盟化的根本动力。

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一般性动机来看, 在地缘政治上制衡中国也是两国追求四边同盟化的重要动力。日本和澳大利亚本身自视甚高, 也想成为地区地缘政治的重要行为体, 因此对与美印共同推进印太合作有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在针对中国方面, 日本不甘居于中国之后, 澳大利亚也想实现地区大国的梦想, 他们都不愿意看到中国经济持续成长。从根本上, 作为美国的盟友, 日澳高度认同美国治下的地区秩序, 从未认真思考过中国主导地区秩序的前景。日本对于追求地区权力的感受会更深刻一些, 毕竟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盛极一时, 被认为有挑战美国经济地位的可能。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日本也一直保持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2010 年中国 GDP 总量超过日本, 引起日本的极大焦虑, 如何再次复兴成为日本的重要议题。在此过程中, 日本对中国表现出了极大的矛盾, 既想通过与中国开展地区合作获取经济收益, 又忧虑中国的崛起会对日本造成安全上的影响。换言之, 日本并不欢迎由中国主导的东亚秩序, 最好当然是由日本自己来主导东亚秩序, 日本当初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动力也是源于此。如果日本不能主导, 由所谓的民主小团体来共同主导印太地区也是日本可以接受的方案, 这是日本推动美日印澳实现同盟化的地缘政治逻辑, 也是日本乐于追求的逻辑, 因为正是美日印澳同盟的形成体现了日本独特的作用。澳大利亚此前更多表现在为追求经济利益与中国开展合作, 在地缘政治上自觉站在美国一边。与日本类似, 澳大利亚显然主导不了印太地区, 也习惯了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 也不愿意看到中国主导印太地区的前景出现。因此, 帮助美日印澳实现同盟化, 实现美日印澳对印太地区排他性主

<sup>①</sup> Joseph S. Nye,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Hegemony from Wilson to Trump,”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5, No. 1, 2019, pp. 63-64.

<sup>②</sup> Asanga Abeyagoonasekera, “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 in Indo-Pacific,” *Daily News*, October 20, 2020. <https://www.dailynews.lk/2020/10/20/features/231856/return-geopolitics-indo-pacific>



导，也成为澳方的重要选择。

相比日澳，印度与美国更相似，同样有全球地缘政治权力野心。印度人不但喜欢讨论印度的崛起，也喜欢讨论和关心在什么时候印度超过美国，甚至讨论印度的超级大国地位，不过理性的印度人也意识到印度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必须先要克服来自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的问题与挑战。<sup>①</sup> 在地缘政治竞争上，印度将美国看作终极超越目标，与中国则是比拼谁才是亚洲的“领头羊”。作为被外界誉为共同崛起的亚洲两个最大的国家之一，印度一直在与中国较劲。为什么印度不支持中国提出来的“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道理比较简单，印度自己不仅想做南亚地区的霸主，更欲成为亚洲的标杆。而要真正成为亚洲的领头羊，超越中国是绕不过去的选择。更何况，在印度的战略认知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地区的重要目标是包围印度，削弱印度的影响，这显然是将南亚视为势力范围、将印度洋视为后院的印度所不能忍受的。印度其实从未刻意隐藏自己的地区野心，也很在意别人是不是认可其是领导性大国。因此，追求地区、世界大国地位及其影响力是印度热衷追捧“印太战略”的根本动力。独立后的印度野心很大，一直试图实现由自己主导印度洋的目标，在“印太战略”时代则更多想凸显印度的领导角色与地位。但实力与能力的局限不断使印度降低预期，最终以通过实现美日印澳同盟这样的机制来追求地区地位，尤其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同盟削弱中国，在中印竞争中胜出。可以说，印度不接受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但其发展出路又不清晰，只能通过参与四边合作计划来寻找机会，这可能也成为解释印度为什么愿意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共同启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的一个原因。<sup>②</sup>

## （二）特殊性动机

在特殊动机领域，美日印澳均有实现四边机制同盟化的相同理由与不同理由。相同的地方在于，美日印澳均将新冠疫情看成精准打击中国的机会，企图重构全球供应链，围堵中国经济。因此，以加强疫情合作为由，快速推进美日印澳四边同盟化。但各国推动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实现同

<sup>①</sup> Komal Malik and Bimal Chandra Kumar, *Superpowering India* (Delhi: Prashant Publishing House, 2016), pp. 1-7.

<sup>②</sup> Ian Hall, *Modi and the Reinvention of Indian Foreign Policy* (Bristol: Bristol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140.

## 美日印澳（QUAD）：从松散协调到同盟行为体

盟化有更多的特殊的不同动机。

就美国而言，当前的拜登政府有转移目标与视线、急于摆脱阿富汗反恐战争失败形象的特殊需求。尽管拜登为自己撤军阿富汗的行为进行了辩解，但国际舆论对美国信誉破产的批评却并未停止。拜登亟需新的“热点”摆脱尴尬境地。美日印澳四边同盟机制本身就一直在美国对外战略的议程上，只是根据时机的选择来决定什么时候推进。此外，进一步修复此前因特朗普执政时期遭到破坏的同盟关系也是促成四边机制同盟化的动力，因为美国需要向盟友传达遏制中国的政治决心。特朗普政府要求盟友承担更多的安全义务，并在若干经济问题上对盟友实行无差别攻击，导致美国与其盟友关系受损。拜登政府旨在通过多边机制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以盟友为基础推动“印太战略”，而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无疑是核心。

印度的考量比较复杂，其特殊的动机有多个方面。一是莫迪亟须一场“闪光”行动来摆脱其在应对疫情方面失败者的形象。印度不仅是新型病毒的受害者，也成为世界的毒源，由其传播而来的新型病毒给亚洲国家造成了严峻的、连续不断的疫情危机，国际社会及其国内舆论对其多有不满。

二是在莫迪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而且中印双方在边境问题上互不相让的情况下，印度有借势美国、要挟中国的战略意图。这也是印度的历史惯例，在中国处于国际困难时，印度往往会乘机制造自以为得利的机会。从四边通过的联合声明可以看到，各方把确保领土完整作为重要原则，实际上这样的内容多半来自印度以及日本的要求，因为这两个国家与中国存在着领土与领海争端。而且从心理层面来讲，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攀上关系、为自己的大国梦想增光一直是印度的渴望，只不过以前做得比较隐蔽，现在则比较公开。冷战时期与苏联结盟，现在则与美国结盟。

三是通过同盟化的方式希望从美日获取先进的武器装备。印度正在加大从美国进口武器装备的力度，而同盟化将为这种军事合作提供便利。据报道印度将采购 30 架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制造的 MQ-9B 侦察无人机，总额为 30 亿美元。该飞机最多可携带 1700 公斤物资，飞行 48 小时。2020 年印度曾经租用了两架 MQ-9B 用于在与中国接壤的边境附近进行侦察。<sup>①</sup> 印度此种心思可以从印度国内对 AUKUS 的态度看出来。印度国内

<sup>①</sup> インド、アメリカから偵察型ドローン「MQ-9B」30台購入へ：台頭する中国と隣国パキスタンをけん制, Yahoo News, Japan, March 14, 2021. <https://news.yahoo.co.jp/byline/satohitoshi/20210314-00227433>

对 AUKUS 的看法有三种：获益论、共情论与警惕论。其中以前两者为主要反应。在获益论上，比如拉贾·莫汉（Raja Mohan）认为 AUKUS 对印度是福音。<sup>①</sup> 在共情论方面，印度媒体和学者表示对澳大利亚加入该军事联盟感同身受，因为澳大利亚遭受中国的仇恨与挑衅，尤其是禁止从澳大利亚进口各种产品，正如印度在拉达克地区被中国“侵略”一样。为了应对中国咄咄逼人的姿态，澳大利亚加入这样的军事联盟是可以理解的。印度媒体和学者还“客观”地分析为什么美国没有邀请印度参加 AUKUS 军事联盟，原因包括印度不是核不扩散成员国、在军事上印度并不像澳大利亚一样依赖美国、因为俄罗斯的缘故美国不愿意轻易与印度分享核潜艇技术、虽然美国与印度有民用核能合作协议但并不包括核军事技术转让等。<sup>②</sup> 可以看出，印度国内对于印太地区的同盟化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为印度积极参与四边机制同盟化做好了心理准备。

日本的特殊动机包括用多边同盟在东海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以及被美国要求追随美国的霸权政策。日本本来就担心美国会放弃对其的安全义务承诺，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任时因担心美国可能从“印太”收缩，尤其是退出了旨在遏制和包围中国的 TPP 而感到焦虑。在新的四边机制联合声明中，日本如愿以偿将东海争端写进了声明之中，这也是日本推动美日澳澳四边合作同盟化的一个重要私心。当然，相对于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对美政策方面选择空间非常小，因为两国都是受美国影响甚至控制的盟友。当美国透露出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时，这两个国家争先恐后急着与中国改善关系，当美国流露出要对付中国的意图时，这两个国家就争先恐后急着与中国恶化关系。当拜登声称要为美国利益流血时，日本和澳大利亚就急着要首先弄清楚什么是美国的利益，而非自己的利益。这也是日澳竭力推动，尤其是紧拉印度进入四边同盟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日澳也隐藏着通过四边合作的同盟化从美国获得更多高端技术的武器装备的企图。尤其是日本，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技术对其是一个

① C·ラジャ・モハン：中国に断固対処する決意を示したAUKUS、最も恩恵を受けるのは非加盟のあの国，Yahoo News，Japan，September 22，2021. <https://news.yahoo.co.jp/articles/834e663fc23c17f8775143ee01f25cee32392d5?page=2>

② Pranab Dhal Samanta，“ET Analysis: Aukus Powers up Five Eyes' Anti-China Plan, Boosts Quad.” *India Times*，September 23，2021.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etreporter/author-pranab-dhal-samanta-479240351.cms>

## 美日印澳 (QUAD): 从松散协调到同盟行为体

巨大的心理刺激,而出于安抚日本的需要,美国对日本的警惕底线会越来越低,日本迟早会成为美国高端军事技术转让的受益者。

### (三) 共同针对性动机

分析一般性动机与特殊性动机可以看出,“中国因素”具有重要地位,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美日印澳同盟共同针对的对象。换言之,共同针对中国已经成为该同盟行为体最重要的动机。截至2020年,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达到101.6万亿元,<sup>①</sup>中国经济总量的规模已经达到美国的七成。<sup>②</sup>根据现实主义的观点,并不存在单纯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将带来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同时上升,尤其是军事投入能力将大幅度增强。因此,奉行现实主义理念的美日印澳这些国家并不会单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去理解中国,而是将经济规模作为硬实力最重要的部分。在这样的条件下,正如在一般性动机部分所分析的,美日印澳都是从地缘政治竞争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提出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美日印澳的国际政治理论话语中,中国所提的“一带一路”无论冠以“倡议”还是“战略”之名,在这些国家看来都是中国通过投资其他国家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即是扩大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与势力范围的举措。也正因为如此,美日印澳都是宣扬“一带一路”倡议“债务陷阱论”的重要推手,印度更是这一论调的始作俑者。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可能被这些国家理解为中国正在全球致力于打造“北京模式”,他们将中国的发展路径污蔑为“掠夺经济学”。<sup>③</sup>近年来中国在话语表达方式上的改变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些国家的这一印象。中国不断加强的战略自信,却引发印、日、澳警惕。中国在印度洋的活动日益活跃,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并加强同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等国的联系,也被认为是中国日益增加的地区影响力的体现。

美日印澳共同针对中国局面的出现是美日印澳同盟行为体生成的最重要的外部动力。所有这些国家都将中国带来的所谓的“挑战”上升到了迫在眉睫的层次。美国自不待言,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就大张旗鼓与中国进行

<sup>①</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2021年2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2/t20210227\\_1814154.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2/t20210227_1814154.html)

<sup>②</sup> 《外媒关注中国经济总量已达美国七成》,参考消息网,2021年3月2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210302/2436129.shtml?bsh\\_bid=5591854470](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210302/2436129.shtml?bsh_bid=5591854470)

<sup>③</sup> James N. Mattis,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8, p. 1. [https://www.ieee.es/en/Galerias/fichero/OtrasPublicaciones/Internacional/2018/Sumario\\_EDN2018\\_EEUU.pdf](https://www.ieee.es/en/Galerias/fichero/OtrasPublicaciones/Internacional/2018/Sumario_EDN2018_EEUU.pdf)

贸易战，且特朗普正是重启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的始作俑者。美国在对所谓“中国威胁”的认知方面的变化也表明美国为何要通过强化四边合作机制来应对中国。中国军事实力与能力的提高是客观事实，但美国增强了防范性与警惕性。美国海军在2021年10月发布的战略指南中指出，中国对美国海军的挑战是诸多挑战中最为长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已经从根本上扩大了其规模和能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舰队，……至少一代人以来，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战略竞争对手，中国拥有与我们竞争的海洋能力，并寻求积极利用其力量挑战美国的原则、伙伴关系和繁荣”。<sup>①</sup>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压缩了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对华战略空间。作为美国的战略盟友，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情况下，这两个国家在多项选择中只能做单选题。有时候可能貌似有多个选项，但真正到需要选边站时，他们并没有太大的选择空间。因此，在美国展现出要遏制中国、打击中国的意图时，日澳的选择显而易见。与日澳相比，印度有着做多项选择题的优势。尤其面临着来自西太平洋的地缘政治压力，中国并没有对印度频频发起的经济挑衅进行相应的回应，希冀留下中印之间在合作上的回旋空间。但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给予印度极大的鼓舞，不仅挑起其试图取代中国经济地位的欲望，也使其看到中国面临着西方包围的困境，从而试图在多项选择中去掉中国。印度可能根据历史经验认为，中国处于压力困难时，面对印度的无度索取只会隐忍。事实上，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已经充分证明这一历史经验不可靠，甚至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霸权国美国对华战略的转变以及中国崛起的势头共同促成了美日印澳共同针对中国。霸权国美国与“取代国”印度在针对中国方面是主动的战略选择，日澳则带有被美国所胁迫的性质，客观来看，日澳这两个国家对中国存在较大程度上的经济路径依赖。但不管对华有什么样的具体矛盾，在这个历史节点上，美日印澳形成了共同针对中国的同盟行为体已经是日益明显的事实，在话语上是否承认“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已经无关紧要，因为都改变不了美国拉帮结派对付中国的事实。至于这个同盟行为体能走多远，则是另外一回事。总之，不管基于什么理由，在2021年这个节点上，美日印澳在“中国威胁论”这个共同利害方面达成

<sup>①</sup> Carlos Del Toro, “One Navy-Marine Corps Team: Strategic Guidance from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ctober 2021, p. 1. [https://media.defense.gov/2021/Oct/07/2002870427/-1/-1/0/SE\\_CNAV%20STRATEGIC%20GUIDANCE\\_100721.PDF](https://media.defense.gov/2021/Oct/07/2002870427/-1/-1/0/SE_CNAV%20STRATEGIC%20GUIDANCE_100721.PDF)



了高度的共识，这是美日印澳同盟化的重要前提条件。这个共识更体现在美日印澳四边联合声明之中：我们努力建设一个自由、开放、包容和健康、受到民主价值观支持、不受恐吓约束的地区。<sup>①</sup> 不言而喻，这个声明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中国。

#### 四、印太背景下美日印澳同盟化对中国的影响

“印太”地区地缘政治态势的演化取决于四个因素：一是中国崛起势头的持续性与在 2035 年前实现强国目标的战略决心与意志。二是美国面对自身衰落的担忧与全面遏制中国的决心与意志。三是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积极介入印太地区事务并成为驱动地区安全化的重要推手。四是处于大国战略竞争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社会发展的意志。四个因素产生的合力将成为推动“印太”地区地缘政治态势演化的主要动力。美国联合日印澳，其地缘政治布局的主要目标仍然是企图以高压促剧变，间接目标是在“印太”地区逐渐削弱中国的优势，限制中国的强国目标，为可能爆发的冲突做好准备。

从大趋势来看，四个因素产生的合力可能将使印太地区两种合作模式的竞争进一步加剧，东盟分裂化或将难以避免。一是以中国推进的主要以经济合作为主的战略伙伴关系网络将继续深化。中国与大部分地区行为体建立起了伙伴关系，比如与大多数东盟成员国与南亚国家建立起了战略伙伴关系。总体来看，中国与东盟、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菲律宾等地区组织和国家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逐渐拓展到安全领域并与多个国家签署防务合作备忘录，但“一带一路”下的经济合作是主线。在南亚方向，与中国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孟加拉国等。中国与日本、澳大利亚也分别达成建立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及面向 21 世纪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全面合作关系。二是美日印澳等推进的以安全为主线的同盟化也将不断拓展和深化。美日印澳等国家同样与南亚和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建立起了战略伙伴关系。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推进的战略伙伴关系毫不掩饰地缘政治目的，尤其在美国明确把中国定义为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的基础之上界定了其在“印太”

<sup>①</sup> 日米豪印首脑共同声明：「日米豪印の精神」。



地区的盟友和伙伴，主要的策略就是要通过印太地区的盟友与伙伴遏制中国，而这种战略伙伴关系的实质正向安全同盟推进，并且推进合作的主要内容是针对中国的安全与军事合作。三是美日印澳普遍在双边、多边、地区组织等层面向东盟国家持久传播所谓的“中国威胁”，这将深刻影响部分国家内部政治局势的变化，导致对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大局造成影响，甚至出现东盟分裂的可能。尤其是美日印澳不断向东盟国家灌输中国妨碍航行自由、中国的崛起影响地区安全、东盟国家必须配合美日印澳等“管理”中国的崛起等观念，也会对东盟国家对两种模式的选择造成重大影响。

客观来看，在两种模式的博弈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同盟化对中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第一，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同盟化对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构成较为严峻的外部威胁，尤其是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应对南海形势造成高压态势。一是美日印澳试探同盟的支持将促使中国台湾当局以及南海争端国加强与中国对抗的信心与决心。二是试探同盟在这些问题上不断加大试探力度，中国不仅可能面临部分国家在“一个中国”政策上的反复，而且在南海问题上的协同对象会日益增多。首先可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区域外国家进行试探，然后美日印澳等国在某个时机采取更激进的动作，尤其在台湾问题上。三是试探同盟与中国台湾当局、南海争端国的军事与安全的合作会对其他国家产生示范效应，会进一步刺激相关国家挑起与中国的争端的决心。

第二，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同盟化与泛安全化趋势将极大冲击中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是美日印澳等将持续抹黑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不讲规则、破坏地区环境”，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透明”等。二是这些国家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将互联互通项目确定为与地区国家合作的重要议题，并以中国破坏规则为前提，构建针对中国的所谓合作规则，与中国形成竞争格局。三是这些国家试图以疫情危机为契机，在疫情溯源问题上继续抹黑中国的国家形象，重构全球供应链，排除中国的影响，或者将中国拒止于新供应链之外。四是部分地区国家对这些国家提供的互联互通项目展现出了浓厚兴趣并与之开展合作，如孟加拉国、马尔代夫、越南等。

第三，美日印澳同盟化对中国与日本、印度等国家在领土领海争议问题的管理上造成困难，并使中国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的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在领土领海问题上，美日印澳同盟的加速形成并扩大为这些国家提供了一种“优势”错觉，会增加这些国家挑起与中国领土领海争端的信心。四边机制中的同盟国家会在中国与日本、中国与印度的

## 美日印澳 (QUAD): 从松散协调到同盟行为体

领土领海争端问题上不断进行挑拨, 不断塑造中国“扩张主义”的形象。而且美日印澳同盟国家拥有话语权的优势, 容易借助这些争端挑起各国民族主义情绪, 促使中国与这些国家管理领土领海争端问题的成本越来越高, 不确定性越来越突出。在恶化双边关系方面, 美国拜登政府频频以“印太战略”为抓手, 推进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四边同盟, 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实施“切香肠”战术, 试图升级更名其在台机构。这说明拜登政府对中国“说一套做一套”, 是“两面人”, 其行为将使中美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 日澳可能进一步放弃经济合作议题, 全面追随美国对华遏制战略, 这不仅使中国与其达成的区域合作协议成果化为泡影, 也将进一步激化双方的民族主义情绪, 推动国家走向对抗。就印度而言, 中印关系本身就处于僵局之中, 莫迪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中得势, 回过头来又极有可能在中印双边问题上进行挑衅, 使两国双边关系面临新的挑战。

第四, 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同盟化扰乱东亚、东南亚合作的态势, 对中国的战略纵深造成影响。美日印澳不断向东亚、东南亚国家重复“中国是威胁”的论调, “众口铍金, 积毁销骨”, 导致中国与其他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态势受到影响。尤其是东盟分裂化可能造成一些关键国家在两种竞争体系之间“选边站”, 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被葬送, 使中国的合作网络遭遇挫折, 并失去一些东盟成员国的合作阵地。再加之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东盟层面对中国的警惕与防范心理会越来越突出, 使之掉入美日印澳“以东盟为中心”的地缘政治布局, 形成对中国进行遏制的前沿, 例如东盟成为四边合作机制的对话伙伴。这样的变数如果产生, 会对中国维护在印度洋的战略利益构成困难甚至威胁。从长远来看, 美日印澳四边合作的走深走实, 实现美日印澳机制的扩大是四国的既定目标, 即推进“四边同盟+N”机制的发展, 而这些重点国家极有可能在中国周边选取, 这将对周边合作与周边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 结 语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和平与发展的大势未变, 但局部地区尤其是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斗争正在加剧,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集中力量在印太地区部署全面遏制中国的企图日益明显。中国当然也不能被动接受美日印澳同盟化。从根本上讲, 美日印澳同盟化对中国的危害要比 AUKUS 的影响更

严重，因为 AUKUS 的军事威胁态势自然会使地区国家心生警惕，而美日印澳同盟的排他性规范却是想把地区国家及组织拉入其规定的轨道以孤立中国。因为其是以规则、经济、供应链的面貌出现，不排除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会受到一些国家的欢迎。当然，归根结底，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与 AUKUS 是一体的，是相辅相成的，均需要中国高度重视。中国的应对应当在几个层次上得到进一步加强。一是在国内发展上不能走偏，尤其要警惕极左和极右之间的撕裂带来的干扰。如果中国能够平稳地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那么美日印澳同盟其实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而且中国稳定发展的时间越久，越能使四边同盟人心浮动，同盟的瓦解或者趋于隐形也不是不可能。二是实施“周边优先”的外交战略，尤其是以大国充分尊重小国的姿态行事。只有周边稳固，中国谋远才有牢固的根基。周边不稳，再宏大的目标也很难有实现的基础。在周边外交中，中国应当高度警惕“讲好中国故事”中的“内宣当外宣讲”的趋势，这种做法下越讲人心离得越远。如何创造话语上的“共亲、共近、共交”是中国面临的紧迫课题。在周边机制上，可以尽可能实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1+1”的领导人年度峰会机制，让周边各国充分感受到中国对其的亲近与尊重。三是重点任务要放在与东盟的合作之上。只要东盟还继续将经济合作作为主要任务，那么美日印澳同盟将东盟纳入遏制中国的轨道这一企图就难以得逞。因此，继续深化与东盟在经济领域的全面合作是今后中国东盟战略的主线。四是发挥中国参与和引导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优势，从经济层面反制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合作趋势可以看出，尽管部分国家对中国有所疑虑，但大多数都能够支持 RCEP 生效，这说明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经济期待并不弱，从中国申请加入 CPTPP 获得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新西兰等国家的支持也能够看出地区国家对中国抱有的期望。中国可以通过加强这样的区域一体化合作，削弱美日印澳四边合作对中国的针对性。最后，针对美日印澳各个国家，我们应当有基本的战略自信，该吵时吵，该合作时合作，该唱高调时不妨也唱下高调，毕竟推动对立关系并不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只会损国家利益，尤其是与多个地区大国同时形成对立关系也是国际关系中的大忌。在斗争激烈的时候，更应当高度重视“巧妙”的外交手段，盲目无限拔高自己以及无限贬低别人都要异常小心，因为这样做的后果往往为合理、科学决策制造麻烦而不是提供便利，这是国际政治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了的。

(编辑 毛悦)

starting point for Chinese policy-making vis-à-vis India.

KEY WORDS: Sino-India Relations; Border Standoff; Secondary Strategic Direction; Primary Strategic Direction

### **The Quad: From Loose Coordination towards an Alliance**

By Yang Siling & Ren Jilei

ABSTRACT: 2021 was a watershed year for the U. S. , Japan, India and Australia vis-à-vis their Quadrilate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which successfully transitioned from a loose coordinating framework to a grouping of allied actors. Review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Quad, three distinct phases can be identified: the conceptual stage; a strategy development stage; and a third phase of evolution towards an alliance. During the first two phases, the Quad was not more than a loose coordinating structure, but in the last it started to take on characteristics of an alliance-like actor. The primary reason we can conclude that it has evolved into an alliance actor is that the organization has started to mold behavioral norms, and it further aims to establish a monopoly over the provision of norm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Three factors have played a role in driving the U. S. , Japan, India and Australia to build the Quad into an alliance actor: first is the pursuit of general interests; second is the global situa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its impact on their relations; third is the formation of a shared targeted goal. These three factors combined worked to shape the Quad into an alliance. As the Quad primary targets China, its emergence as an alliance will have impacts on China's security environment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response, China should implement its "neighborhood first" strategy, promote the "1+1" Leader's Summit on Mutual Respect with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advance the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These steps can help China respond to the rapidly changing Indo-Pacific geo-political situation.

KEY WORDS: The Quad; United States; Alliance; India; Quadrilate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 Initi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the Position of BJP in India: A Perspective Based on Local  
Electoral Politics**

By Yang Lu

ABSTRACT: Poor governance performance will weaken the position of a ruling party vis-à-vis electoral outcomes. As one of the worst performing governments in the world vis-à-vis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BJP government should have been negatively impacted at the polls due to its poor performance. While so, the six local elections held since October 2020 have made it clear that the BJP's miserable governance record has not in any way harmed its political position. To explain this anomaly, this article conducts an analysis of dynamics around local state elections, looking at three factors: India's political system, the BJP's election strategy and the BJP's mobilization strategy. It argues that the BJP election strategy has astutely exploited relations between the center and localities, provoked sectarian conflict and focused on developmental issues as a means of diverting attention from its shirking of responsibility on COVID-19. Meanwhile its mobilization strategy has targeted both elites and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n collectively working to eliminate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the pandemic on the party.